

太行抗日根据地 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

Tai hang Kangri Genjudi Zhonggong Nongcun Dangzuzhi Yanjiu

李秉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北京大学专业技术岗位青年人才支持计划、
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BMU20090560）资助

太行抗日根据地 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

李秉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研究/李秉奎著.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98-1011-8

I. ①太…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
—研究—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IV. ①D26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6964 号

责任编辑:潘 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215 千字

印 张:9.375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011-8

定 价:20.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对这些根据地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专门研究，似乎还很少读到。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的普遍建立，主要是八路军、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带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当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后，如果不能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中迅速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建立起各级党组织，使它成为团结并领导当地民众核心力量，党就不可能同当地民众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不可能在这些地区真正站稳脚跟。一旦军队转移或忙于作战，根据地就难以持久地坚持下去，更谈不上从小到大地发展。这是能否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能否将敌后抗战长期地坚持并发展的重要关键。

农民本来是小生产者，很多又是小私有者或者向往能成为小私有者。要把他们改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哪里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八路军、新四军进入这些地区时，首先要忙于异常紧张的反扫荡武装斗争，不可能全力从事这项工作。客观形势又那样紧迫，不允许像和平时那样从容不迫地待条件成熟后再开展这项工作。这就决定了这些根据地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不能不异常艰难。既要能大刀阔斧地尽快打开局面，又要能妥善地处理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后人难以想象的种种矛盾。这项工作又不能孤立地进行。它

同整个根据地蓬勃开展着的抗日游击战争、政权建设和社会变革密不可分，彼此强烈地相互影响。因此，这又是一项很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

本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选择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代表性的。他又投入很大精力，以丰富的当地原始档案、县地方志、回忆资料和当时报刊为主要依据，广泛参考国内外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写成这本著作，对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中共农村党组织发展的基本过程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这样的著作以往还不多见。

作者没有回避太行根据地建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当时如果没有这些矛盾和困难，什么都一帆风顺，那倒是令人无法理解了。但正如作者在本书结论中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当时及此后中国政治命运的历史巨变。”“中共从一个根据地偏居西北一隅的政治力量发展为能向国民党中央权威提出强有力挑战的大党，不仅在农村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同国民党进行生死较量的政治资本。”中国老话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和以后的胜利发展，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好地证明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太行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得来是十分不易的。

金冲及

2011年4月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回顾	9
(一)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9
(二) 关于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研究	13
三、研究方法	25
四、文献说明	30
第一章 党组织的建立与大发展	37
一、抗战前的组织状况	39
二、抗战初期的推动力量	45
(一) 牺盟会	47
(二) 八路军	58
三、抗战初期的组织大发展	67
第二章 入党动机与阶级构成	80
一、党员的入党动机	81
二、组织的阶级构成	102
(一) 工人	106
(二) 贫雇农	112
(三) 中农	118
(四) 地主富农与地富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	120
第三章 动员运动中的党与党员	125
一、扩军运动与农村党组织	127
二、征粮运动中的党与党员	135

第四章 党组织的整理与巩固	140
一、党组织的整理与改造	142
(一) 组织紧缩与成分调整	144
(二) 思想教育的努力及效果	157
二、形势变动中的政权与党员关系	169
(一) 政权改造运动中的党政关系	170
(二) 村选运动与党内结构的变动	177
三、党员与群众关系的初步调整	187
(一) 春耕运动与中共政治根基的深入	190
(二) 村选运动对党群关系的影响	194
(三) 战争环境影响下的党群关系	199
第五章 双减、整风中的党组织	202
一、群众运动的兴起与党群关系的转变	204
二、劳动互助运动中的党群关系	213
三、整风运动与党组织的改造	219
四、农村支部整风运动三例	231
(一) 解决宗派矛盾问题的王曲支部	233
(二) 解决干部腐化问题的桐滩镇支部	236
(三) 解决干群矛盾问题的黄花支部	239
余 论	241
附 录	253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92

表格目录

表格 1	太行根据地周边地区部分“维持会”成立状况一览表	58
表格 2	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工作团建党活动一览表	62
表格 3	林县某党小组入党动机一览表	101
表格 4	晋东南各类支部数量统计	108
表格 5	和辽战役时太行根据地扩军人数统计	133
表格 6	1938年至1940年太行根据地三县十三个村土地所有权变动情形	153
表格 7	辽县党内文化教育调查表（1940年12月统计）	160
表格 8	晋中地委三县（平定、昔阳、和东）党内文化教育调查表（1941年5月）	160
表格 9	晋东地委区党内文化教育调查表	160
表格10	太南地委区党员文化程度统计表（1941年6月18日）	160
表格11	武乡根据地内的村庄会议类型	167
表格12	太行根据地村级“三三制”执行情况统计（1941年12月）	185
表格13	左权县支干党员参加劳动互助情形一览表（1944年10月）	218
表格14	1944年太行根据地各县党员文化程度统计	222

导 论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其他政党不同，在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织突出地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严密的组织性。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域内，中共基层党组织未必完全如中央领导层所希望的那样，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共对于鲜明阶级性与严密组织性的追求却是一贯的。发展党员、执行候补期、交纳党费、政治学习等方面，几乎都体现出中共在上述两方面的追求。同时，中共的组织形式及共产主义信仰，受列宁主义影响深厚，诸如“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等内容的政治诉求是全新的话语体系。具体革命实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之间的距离，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切实地去面对。

在最初组织动员与发动革命时，基层党组织有时甚至连“什么是共产党”都不容易向农民解释清楚。抗日战争爆发前，华北一些农村中曾有将共产党称为“均产党”^[1]、“混产党”^[2]

[1] 苏博光：《冀南春雷——冀南暴动片断回忆》，载《河北革命回忆录》第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2]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的现象，有人看待入党甚至类似宗教皈依那样称为“在”党^[1]。在革命基础较为薄弱的山西农村，就连赵树理这样后来成为“红色”知识分子的读书人，都“根本没有见过共产党，也从未看过共产党的书籍，不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2]。直到抗战爆发，中共党组织及八路军在太行地区大量出现，当地仍有人将八路军与中共统称为“红红”。^[3]在农村对中共党组织认识并不清晰的情况下，中共是如何进入原本疏离于上层政治的农村，又如何尚不知革命为何物的农民中发展党组织？在成分、组织、思想上，中共党组织对党员都有着较高的要求，来自农村基层的农民党员又是如何表现的？在民族战争与国共纠葛的抗日战争时期，上述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激发了研究者的探求欲望。

在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内，中共从根据地偏居西北一隅的政治力量发展为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大党。抗战爆发前后及抗战结束前后的几份电报，或可成为中共实力发生重大转变的见证：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四项保证”：即“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

[1] 苏博光：《冀南春雷——冀南暴动片断回忆》，载《河北革命回忆录》第1辑，第28页。

[2] [美]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3]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二：党的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另参见赵树理的小说《照像》，载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1]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又致电蒋介石，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2]。几天后，中共中央又在“四项保证”基础上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澈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3]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等地区迅速发展；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越来越不得人心，它的军队主力基本已退缩到远离战火的西部地区。1944年9月4日，当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大溃退时，中共便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的主张。^[4] 1945年8月30日，中共根据双方力量分布的实际情况，要求在陕甘宁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此外在绥远、河南、江苏、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

[1]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37年2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58页。

[2] 《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1937年7月8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3]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载延安《解放》（周刊）第1卷18期（1937年10月2日），第1页。

[4] 《中央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324页。

四个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1]10月26日，中共又提出，国民党军队在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等8条铁路上，“无运兵必要”。稍后，毛泽东又增添热河、沧石、白晋、道清4条铁路，明确提出此12条铁路线“不得驻国民党军队”^[2]。

从前后两番电报的内容来看，在短短8年之间，国共关系及实力对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此消彼长、此退彼进，抗战结束4年后，国共两党较量的最终结果是说明中共实力发生根本改变的直接注脚。由此肇始，“历史〔正在〕走上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的一边是整个历史的旧时代的结束，分界线的另一边是整个历史的新时代的开端。”^[3]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抗战结束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和抗日战争前已经大大增加了。”^[4]事实确是如此。

中共是如何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是学术界长期关心并致力研究的重要问题。以此为出发点，许多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2年底，彭德怀在回答“什么是根据地”时曾指出，“在某些地区（如北岳区、太行山、山东）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

[1] 《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载《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2] 《同国民党谈判的补充意见》，载《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2、51页。

[3] 胡愈之：《人民的和平·人民的民主》，载上海《进步青年》创刊号（1949年5月4日），第7页。

[4]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9页。

公开地合法地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这样的地区，就叫做革命根据地。”^[1]

按照彭德怀的说法，中共建立根据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发展党的组织，并通过党组织对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的领导，推行各种战时动员政策。党组织的建设，在抗日根据地斗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党组织的领导又绝非仅仅通过一个文件、一次会议就能实现。中共党组织在根据地某些地方对政权、武装、群体团体“清一色”地包办，在另外一些地方又形同虚设，这些虽然是较为极端的现象，但是又并不罕见。如何在党政军群“四位一体”的动员体系中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根据地经常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党组织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的关系来看，研究者不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涌入党内数量巨大的农村基层党员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同外来干部相比，来自于根据地本土的农村基层党员既是各种动员的组织者、参与者，又是各种动员的直接对象，处于动员主体与客体紧张关系中的农民党员是如何在组织与个人间进行利益取舍的？

过去对于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常出现“走马观花”、以偏概全的现象。有些著述甚至东拼西凑地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史料粘贴在一起，然后却得出一个宏观的、甚至是关于整个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结论。^[2]这样的研究能否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能否经得住推敲，确是值得怀疑。选择适当的研

[1] 《彭德怀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18日，载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1页。

[2] Lyman P. Van Slyke, "Foreword", in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ii.

究地域、避免重蹈覆辙，似应是深入研究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的基本前提。是否可以这样说，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来选择恰当的区域，不仅能够使认识深入下去，而且还可以克服研究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实际困难。^[1]

在中共领导的诸多抗日根据地中，一般来说更容易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陕甘宁和晋察冀，前者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枢的所在地，后者早在抗战初期就被誉为“模范根据地”。在这两个亮点的辉映下，学术界对于太行根据地（又称晋冀豫区）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

太行根据地，是1941年成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区。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曾经长期在此指导华北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因此，日军的文献中曾有“延安为总后方，晋冀豫为前方总根据地”^[2]的说法。1948年5月，晋冀鲁豫根据地与晋察冀根据地合并。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基础。更使太行根据地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中日、国共两方三派力量在该地区“或起或消”、势力交错。可以说，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更能体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复杂与多变。因此，太行根据地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当中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不言而喻。但是，以往人们对于这一根据地的研究并不充分，所以本书将研究目光投向这一地域，从而试图回答上文所提出的诸多疑问。

值得说明的是，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党组织，

[1] 关于区域研究的讨论，参见〔美〕柯文（Paul A.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尤其是第178—188页。

[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译印，第151页。

除包括兵营、工厂、党政机关的分支外，更多地主要分布在广大农村。在太行根据地核心区域的晋东南，农村支部甚至占到总数的 78% 左右。^[1] 正是因为农村支部在太行根据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所以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农村支部及农村支部内的农民党员，或许能说明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内的一般性问题。此外，中共党组织的历史有很多侧面值得深入考察，其中包括党组织的形态、结构、功能、上下级的联系、党政军群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然而，无论现有文献资料，还是作者的研究能力，都不足以实现多侧面、多角度的全面研究。“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本书拟从有限的条件出发，以建立、发展、巩固为主要内容，对太行根据地的中共农村党组织进行粗略的勾画。其中也会涉及有关组织构成、组织功能、党政党群关系等问题，但是本书并不打算完全以此为核心。这样的处理，主要是为避免撰写过程中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当然也有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的考虑。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动。在当时的党内文件中，“根据地”一词经常发生着扩大或缩小的变化。“巩固区”、“游击区”与“解放区”，“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这些词语指代的地域范围自然不是静止不变的。从事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学者，恐怕难以回避这一复杂现象。

本书重点研究的晋东南和冀西地区，虽然曾有一个时期几乎大部被日军占领，但是在此外的较长时间内，晋东南主要由中共领导的党政军群稳定地掌握着，冀西多数地区的情况也基本

[1] 《晋东南七月份报告：太南各县委状况》，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A5—1—13—1，第 17 页。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档案的文件名与档案馆工作人员所标文件名不相符，后文一般采用原文件名。此外，档案涉及的个人隐私部分经过技术处理，后文不再标明。

如此。日军发动“治安强化”运动前，控制的主要是一些“点”和“线”，还不能控制整个“面”，但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过“六路围攻”、“九路围攻”。尽管如此，太行根据地仍有些地方的农民并未亲眼见过日军。在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的辽县、襄垣、陵川，甚至还有“一心堂”、“长毛道”等会道门公开宣传“日军不杀人”^[1]，这或许是当地的农民并未切身感受日军侵略的缘故。因此，以晋东南、冀西的“巩固区”为主要研究地域，可以看到太行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在整个抗战时期呈现出的连续性，也能看到根据地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党组织的影响。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抗战前期、中期的豫北是中共在太行根据地掌握较为薄弱的地区。1938年底，从整个太行根据地来看，工作已经“开展起来，干部活跃了，党扩大了”。但是，在豫北地区，“党的力量很薄弱”。^[2]1939年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在豫北聚集，国共冲突加剧。1940年，国共划分驻军区域时又以林县姚村以北、平顺壶关以南的大井至郭家坨一线为界。此后几年，豫北的许多地方实际转由国民党控制。这一现象，基本延续到抗战后期太行根据地的重新扩大。豫北整体的政治形势与晋东南、冀西的多数地区也有很大不同，例如武安北部的多数乡村直到1940年日军到来才“进入”抗战时期，

[1] 卓新：《论组织工作之灵活性与具体性》，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A01—02—0044—003，第3页。

[2] 何英才：《晋冀豫区党的建设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何英才同志在区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38年12月24日，山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宗号：A01—02—00025，第2页。

豫北多数地区的秩序在 1942 年前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1] 由此看来, 豫北地区呈现出与晋东南、冀西明显不同的形势特点。因此, 本书的研究区域多数情况下只限于晋东南及冀西地区。

二、学术史回顾

(一) 关于中共组织史的研究

长期以来, 对中共党员、党组织进行的考察多被列为“党建”、“组织史”的研究领域。早在 1950 年代初期, 国内就有人开始此方面的资料搜集和积累。但是, 总体说来, 系统研究的开展却要晚很多。中共党建史、组织史方面的资料搜集整理与系统研究, 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广泛关注^[2]。鉴于“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党, 至今还没有写出一部自己的组织历史”, 1984 年 12 月第三次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时, 党内下达“征集、整理、编纂中共组织史资料的任务”^[3]。这一任务下达后, 有关中共组织史方面的资料征集与研究成果渐次增多, 直至各省、市、县甚至某些大型厂矿都先后编写并出版各自的“中共组织

[1]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58. 后来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华北人民政府驻地的武安, 虽然现在划入河北省的管辖范围, 但是当时却是河南省的辖区、豫北的一部分。涉县的情况也与其类似。

[2] 最早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的, 应是中央档案馆的裴桐和赵朴等人, 他们在 1957 年 2 月编写了《党的组织史讲课提纲》。1980 年代初, 赵朴又在《党史研究》杂志连续刊载组织史资料, 并“受到普遍欢迎”(见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一书的“前言”部分,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这些都为后来的中共组织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3] 《冯文彬同志在中央组织史资料编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载《福建党史通讯》1986 年第 6 期, 第 6、5 页。